

我看 赫鲁晓夫

5.127.5

我看 赫鲁晓夫

〔苏〕 布尔拉茨基 等著



苏联新思维译丛

责任编辑：薛克夫

封面设计：孙 敏

我看赫鲁晓夫

〔苏〕 布尔拉茨基 等著

思 谋 选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6 字数：124 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2-0209-5/D·17 定价：2.20元

编者的话

赫鲁晓夫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他在苏联执政的11年中，报刊上赞扬之声不绝于耳。然而私下里，不少人对他啧有烦言。在苏联境外，毁誉之不一更其鲜明。即以我们中国而言，便曾有过截然相反的评价，或尊他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或斥他作共产主义事业的叛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合法地拉下台了。从此他消声匿迹，直到1971年去世，安葬在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然而他依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西方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引起一番轰动。在苏联，他的墓前偶尔也会发现不知是谁献的花束。但是在公开场合，倒好像没有争议，或者毋宁说，议论这个人物倒好像是某种禁忌。在苏联，也在我们中国，听不见有谁再提这个人物，仿佛他是永远消失了。

这几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改革和新思维的潮流冲刷着当今的苏联社会，也势不可遏地涌入苏联历史上的空白点或禁区。论人物，居于中心地位的当然是斯大林，此人的功过是非不属于我们这本小册子讨论的范围。另一位就要算赫鲁晓夫了。史料陆续披露，评论也日益直率。在“不忘记任何一个人”的号召下，赫鲁晓夫在人们的记忆中复活了。

赫鲁晓夫再认识的兴起，是活跃的苏联思想解放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赫鲁晓夫代表着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整整一个历史时期。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和继承，包括自觉的和不自觉

的，对苏联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全部活动中具有核心意义的个人崇拜问题（他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制造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中屡屡出现的重大实际问题。批评他也好，赞扬他也好，只要想认真进行改革，推动社会前进，就不能不首先承认这个人物的存在，承认他在苏联历史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然后还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他的成败得失，以为后人借鉴或警戒。

收入这本小册子的三篇文章，照我们看来，大体上可以认为就是属于这种对于赫鲁晓夫的再认识的。

文章三位作者的经历有某种相似之处。赫鲁晓夫当政时期，正值布尔拉茨基和阿朱别伊春风得意。前者作为苏共中央某部的工作人员，多次随赫鲁晓夫出访，参加起草过许多文件，可以说是赫鲁晓夫写作班子中颇受青睐的“秀才”。后者则是赫鲁晓夫的乘龙快婿，他平步青云，几年之内由一名大学毕业生一跃而为苏联第二大报《消息报》总编辑。那些年随乃翁周游世界，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不免溢美之辞。赫鲁晓夫下台，跟着倒霉的首先是阿朱别伊，接着布尔拉茨基也遭牵连。他们先后丢官，后来才分别当了《苏联》杂志的编辑和《文学报》的政治评论员。麦德维杰夫的情况略有不同。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在赫鲁晓夫当政时酝酿并写成了《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这本颇有份量的著作。这本书在苏联未能出版。赫鲁晓夫下台后，麦德维杰夫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并于1969年被开除出苏共。不过他一直没有放弃写作。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他的文章开始在苏联报刊上公开发表，并且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

三位作者的这种经历，使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同情赫鲁晓夫，而不大会重复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对他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但是他们也没有只顾个人感情的宣泄而对所论人物一味肯定。布尔拉茨基借用毛泽东常用的“两条腿走路”的譬喻说，赫鲁晓夫“一条腿勇敢地迈进了新时代，另一条腿却陷在过去的泥潭里拔不出来”。换句话说，布尔拉茨基认为，赫鲁晓夫是个改革者，但又是个不彻底的改革者。至于他后来落得个悲剧性的下场，则除了“整个社会还没有为根本性变革做好准备”这一客观原因外，他本人性格上的弱点也起了作用。布尔拉茨基引用了丘吉尔1956年当面对赫鲁晓夫所作的告诫：“赫鲁晓夫先生，您打算进行重大改革。这很好！我只想建议您不要太性急。想两下就跳过深渊是很难的，可能会掉下去！”布尔拉茨基还补充了一句：“当你不知道该朝哪边跳的时候，也跳不过去。”

在一系列具体事件的评价上，作者们的评论应该说也是比较公允的。对于反对个人崇拜、开荒、“玉米革命”、农业改革、科技和空间开发、党政机构改组、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中的功过是非，文章的评价尚不见失之过分偏颇之处。对于苏斯洛夫针对赫鲁晓夫的指责，麦德维杰夫逐条评论，为赫鲁晓夫申辩，但是他也不讳言：赫鲁晓夫性格上的简单粗暴逐渐发展到飞扬跋扈、个人专权，是他最终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阿朱别伊的文章，通篇赞扬，倾向性鲜明，情绪比较激烈，但是在赫鲁晓夫同知识分子关系问题上，也还没有一味为他开脱。

三位作者或者同赫鲁晓夫有过长期的个人交往，或者认真地广泛地收集了史料。他们的文章中透露了不少确凿而又生动的材料。不论是赫鲁晓夫本人喜欢絮叨他的得意之作

——争取苏共中央主席团多数人共同制服贝利亚，也不论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慷慨陈词，历数罪状，为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立了汗马功劳，都是局外人难以了解的事实。这些事实材料，正是使本书具有特殊吸引力的主要因素。

布尔拉茨基和阿朱别伊都是有经验的新闻记者，麦德维杰夫的文字也见功力。他们善于从细微处着墨，烘托赫鲁晓夫政治上的成功和挫折。赫鲁晓夫的言行举止、性格作风，在他们笔下无不绘声绘色，使这位热情迹近粗鲁、直率又不至于狡诈的复杂人物，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赫鲁晓夫继斯大林之后，对中苏两国关系的演变，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对中国本身的发展，都起过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多数读者说来，这个人物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苏联国内对于赫鲁晓夫的再认识，无疑会引起我们中国不同年龄的人们的广泛兴趣。这便是促使我们编辑这本小册子的动因。收入这本小册子中的三篇文章，是从现在已经发表的材料中选出的。它们比较具有代表性，当然并不是所有他们的观点在苏联都被公认正确，更不用说我们以及我们中国的评价了。随着苏联再认识的深入和新材料的公布，我们也许还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至于编辑翻译工作是否差强人意，就要等待读者们评判了。

1988年11月7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赫鲁晓夫（政治肖像素描）1

那十年29

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168

赫鲁晓夫^①

（政治肖像素描）

费·布尔拉茨基

这里要谈的是赫鲁晓夫和赫鲁晓夫时代。那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而且也可能是最复杂的时期之一。说它重要，是因为它直接与目前国内进行的改革，与目前的民主化过程有内在联系。说它复杂，是因为它涉及的是最初被称做“光辉的”，尔后又被谴责为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盛行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曾召开过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一大。这两次代表大会反映了尖锐的政治斗争，同时也为我国制定了新的方针。在赫鲁晓夫时代，为恢复列宁的原则和净化社会主义理想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当时还开始了从“冷战”向和平共处的过渡，重新打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窗口。在这个历史的大转折中社会深深地吸进了革新的空气，同时也被呛过……不知是因为吸氧过多，还是因为氧气不足。

在很长很久一段时间内，人们对这些暴风雨的年代照例是闭口不谈。似乎是有某个人从我国的编年史中撕下了整整

① 本文译自苏联《没有别的选择》一书（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8年出版）。——编者

一章。在将近20年中，赫鲁晓夫的名字一直成了禁忌。但是生活本身是一定会出来讲话的。在戈尔巴乔夫关于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终于谈到了当时的情况。这是人们期望已久的。他谈到当时做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还没有做完，或是做得不当；谈到哪些做法一直延续到80年代，哪些做法在停滞时期已经消失。

然而，与当代历史上的一次转折密切相关的那个人，他那复杂而矛盾的个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我不准备回答人们积在心头的所有问题，而只想谈谈个人的一些回忆，并且通过今昔对比提出几点看法^①。

是谁发现谁——是历史发现个人，还是个人发现历史？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多，我写过20世纪的一些彼此不同以至相反的政治人物：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和邓小平。也写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写过肯尼迪。但时至今日我自己仍无法对这个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

大家都还记得，布尔加科夫^②曾说过：如果我们对未来就那么千把年都心中无数，怎么还谈得上人类意志的自由呢？他还说过：砖瓦是不会无缘无故落到人的头顶上来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也是在青年时代就被灌输了相信命中注定的思想。当然当时是用科学的语言称呼它的：规律性。可能这是从黑格尔那儿来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就是说，已经发生的事，就是理应发生的事。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们才开始懂得历史有多种方案，有各种可能性。参加角逐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卒沉底

① 本文作者60年代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曾多次陪同赫鲁晓夫出国访问。

——原编者

② 布尔加科夫（1891—1940），苏联俄罗斯作家。——译者

就能升后，后落入圈套也能成卒。有时卒会异军突起，一步就能置后于死地。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讨论“人民和个人”的问题。归根结底，正是由来自人民当中的社会和精神动力决定时代的面貌。但是在某个具体时期，伟大的历史人物也能在时代上留下深深的痕迹。无论如何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政治活动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不仅充当历史的工具，而且能通过最直接的方式影响事件和前途。

斯大林之后怎么偏偏会是由赫鲁晓夫来领导国家呢？斯大林为了“清除”自己在党内的一切敌人，包括真正的和虚构的，“左”的和“右”的，似乎已经尽了一切努力。50年代人们当中流传着斯大林的一句格言：“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也就没有问题了。”结果，活下来的，看来就只剩下最忠实最可靠的人了。但是斯大林怎么就没有看透赫鲁晓夫是对自己个人崇拜的掘墓人呢？

在斯大林晚年，即临终前不久，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已经失宠。当年斯大林曾经在这两个人的帮助和支持下消灭了其他一些领导人，这时斯大林看来又在为他们安排着同样的命运。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取代人数较少的政治局，则是为“干掉”另一批老战友而采取的一个步骤。然而，斯大林却没有在赫鲁晓夫身上“作孽”，——真是咄咄怪事！

是因为老糊涂了吗？看来不是。尼科罗·马基雅弗利^①对暴政的揭露可谓入骨三分。他曾说过一句话：“如果布鲁图^②装成一个傻瓜，他就会成为恺撒”。我认为赫鲁晓夫就是通过某种方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唯唯诺诺，毫无野心的

① 马基雅弗利（1649—1527），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和作家。——译者

② 布鲁图（公元前85—42年），反恺撒阴谋的领导人。——译者

人。我听说，在领袖最后30年的住所——孔采沃附近一座别墅里召开漫长的晚间会议时，赫鲁晓夫经常跳乌克兰的戈帕克舞。当时他身穿乌克兰的斜领衬衫，装扮成一个“真正的哥萨克”，一个绝无权欲，只知按别人意志行事的人。但是，当时赫鲁晓夫显然已经把自己的反抗心理埋藏在内心深处，而在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天便流露出来了。

赫鲁晓夫掌权并非偶然，但同时又有其偶然性。说它并非偶然，是因为他当时代表了党内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在另外一些条件下曾经以捷尔任斯基、布哈林、李可夫、鲁祖塔克、基洛夫等这样一些彼此大不相同的活动家为代表，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拥护发展新经济政策，拥护民主化，反对在工农业领域，特别是在文化领域采用强迫手段。尽管斯大林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是这股思潮一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上台是必然的。

当然，这里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假如马林科夫同贝利亚串通起来，假如“斯大林近卫军”是在1953年，而不是在1957年团结一致，赫鲁晓夫就不会成为领袖，我国历史发展的途径就会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很难做出这样的假设，但实际上那确是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

然而，历史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对我国生活中现实问题做出的回答。当时农村日益贫困，实际上已经处于半破产的境地，工业的技术落后，住房奇缺，居民生活水平很低，数百万人被监禁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改变政策，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于是，赫鲁晓夫出现了，他确实代表了人民的希望，成了新时代的先驱。

当时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的一切都使我们非常激

动。赫鲁晓夫明知绝大多数代表都会反对揭发，却还要做有关斯大林的报告，这决心是怎么下的呢？他的勇气和最后必胜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位政治领导人为了崇高的社会目的，把个人的权力，甚至生命孤注一掷，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斯大林之后的领导成员中没有任何人敢于做这类有关个人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只有赫鲁晓夫才能做到这一点。他是那样的勇敢，那样的充满激情，但在许多方面又是那样的缺乏深思熟虑。必须具备赫鲁晓夫的性格——无所顾忌，敢于铤而走险，必须经受过苦难、恐怖和阿谀奉承的考验，才能下决心走这一步。请看他本人在与外国朋友会见时是怎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在二十大上做那个发言的：

“人们常常问我，是怎样才下决心在二十大上做这个报告的。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信任他！不断抬高他，制造个人崇拜。忽然间来了一个大转变……

“现在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自打我童年学认字起就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有本书叫‘朗读演员’，上面有许多非常有趣的故事，我在这本书中读过一个小故事，作者已经想不起来了。讲的是在沙皇时代监狱中关了一批政治犯，有社会革命党人，也有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其中有个上了年纪的皮靴匠，名叫扬凯利，他是偶然被投入监狱的。当时犯人们选号长。每个党都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大家激烈地争论起来。怎么办呢？有人提议选皮靴匠扬凯利，说他是老好人，并且也没参加任何党。听罢大家都笑了起来，但后来都同意了。于是扬凯利就成了号长。后来大家一致决定要越狱。人们开始挖地道。也不知道挖了多久，但终于挖成了。这下子又产生了问题：谁第一个进地道。因为有可能狱吏已经发现了地道，并且正持枪守在那里。

谁第一个出去，他就有可能第一个牺牲。一些人让社会革命党的战斗队员先走，另一些人让布尔什维克们先走。这时上了年纪的皮靴匠扬凯利从一个角落里站起来说：“既然你们选了我当号长，我就应当第一个走出去。”

“我在二十大上的情况也是这样。既然把我选为第一书记，我就有责任象那个皮靴匠扬凯利一样，我应当说出有关过去的真情实况，不管为此我要付出什么代价或冒什么风险。列宁曾经教导我们，敢于讲真话的党是永远不会灭亡的。我们从过去中吸取了教训，我们希望我们的兄弟党也能吸取同样的教训，那时我们共同的胜利才会有保证……”

并非所有的人都记得赫鲁晓夫的“解冻”包括两个时期，而不是一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53年3月到1957年6月；第二个时期是从1957年6月到1964年10月。早在1953年年中我们便根据领导的指示起草了一篇文章《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并将它发表在我当时工作的《共产党人》杂志上，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官僚主义、营私舞弊现象，提出了发展民主的问题（而在此之前写文章的重点都是放在个人的作用上）。苏共二十大使这一方针达到了顶峰。

当赫鲁晓夫作有关斯大林的报告时，我未能参加大会。大家都知道，报告是在选举出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并且赫鲁晓夫本人当选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作的。大概他认为在选举前做报告是轻率的。这一点决非偶然。当时我通过同许多党的工作人员的谈话确信，赫鲁晓夫采取的行动有很大的风险。

在我见到了我们杂志的一位编辑帕韦尔·阿夫里卡内奇·乌索利采夫（让我们就这样称呼他罢！）时，我才第一次感到情况的严重性。他当时是代表大会秘书组的成员。晚上

他直接从会场来到编辑部，一屁股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一言不发，脸色苍白。其实不仅是苍白，而是面如土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帕韦尔·阿夫里卡内奇？”我问道。他却继续沉默着，甚至连嘴唇也不动一下，象是舌头被卡在牙齿当中了，无法转动。过了片刻。我让他喝点水。他喝了一口又一口。坐了一会儿，还是一语不发。

“别让人着急了，帕韦尔·阿夫里卡内奇！是把什么人撤职了，还是把哪个不合适的人选上了？还是决定要停办咱们的杂志？”我不知趣地说着俏皮话。

“杂志……跟杂志不相干……人们透露了一些事……不知该怎么想……该往哪儿走……该怎么办？”

“看来该回家了，已经晚8点了。我留下来这么久就是为了想听你说说。”

“不能说。专门讲过，不许扩散。否则敌人会利用它把我们彻底搞垮！”

“怎么可能搞垮呢，帕韦尔·阿夫里卡内奇？我们有最强大的国家和连美国都害怕的军队。不久前又爆炸了一颗炸弹。这回不是原子弹，而是氢弹。”

“问题不在这儿。”阿夫里卡内奇皱了皱眉头说：“有各式各样的炸弹。它也是一枚炸弹，不过它是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不知道，爆炸后会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些什么，也不清楚。”

“帕韦尔·阿夫里卡内奇，你总是打哑谜。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能说，你懂吗，我不能说。我没有权力说。等着吧，可能总有一天会通报所有人。由官方通报。因为所有在报刊工作的人都应当知道，党的工作人员也应当知道。会提

出成千的问题……”

当天晚上，我到底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几天之后，我们所有人，至少我们杂志的全体工作人员就都知道了“秘密报告”的内容。没过多久，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个报告通过某些渠道落到国外舆论工具的手里，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党和整个国家将走上新的道路。不清楚的只是，这将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新的决策要经多久才能见效。所有人都想继续航程，并尽快到达宏伟的目标。但是许多人担心探索新的道路和摧毁旧传统会使局面失去平衡，导致翻船。这些人当中当然也包括乌索利采夫。其实，他的思想所反映的只是50年代许多党的工作人员的思想情绪，而且所反映的也只是这种思想情绪的一小部分。他们反对“秘密报告”。显然，围绕过去的遗产特别是围绕着眼未来的新决策将有一场尖锐的斗争。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过赫鲁晓夫讲他对斯大林的回忆，他一个人边想边讲，一讲就是几小时，象是同自己谈话，同自己的良心谈话。他的身上有斯大林主义给他留下的深深的伤痕。在这里一切都搅在一起了：既有对斯大林的神秘的恐惧（因为斯大林为了一步之差，为了一个手势，一个眼色就能把任何人消灭），也有因看到无辜流淌的鲜血而引起的恐怖。在这里既有个人的内疚，又有几十年来积压在内心的反抗情绪，它现在正如锅里的水蒸气一样冲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为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们举行的宴会上的发言很有代表性。

当然，老一代的人都还记得这位颇有特色的人物形象，而年轻一代则可能连他的肖像都没见过。当时他已年过60，

但是看上去却非常健壮、灵活并且快活得近乎顽皮。他那宽阔的面庞，上面长有两个小肉瘤，宽大的前额，秃顶，翘起的大鼻子和一双扇风耳，简直就象来自俄罗斯中部农村的农民。再加上他那敦实的身材和那几乎不停比划着的双手，更使人产生一种普通老百姓的印象。只有他那对目光犀利的小眼睛，时而显得慈祥，时而显得盛气凌人，气势汹汹。我要再重复一遍，只有他那对眼睛才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饱经世故，能应付风云变幻的地道的政治人物。

我当时看到的他就是这样，而且印象中的他也是这样。不过更吸引我的还是他的讲话。我所听到的，而且当着我的面至少重复过两次的话，都是在只有几个人在场的情况下，在更小的范围内说的。但令人吃惊的是每当他重复说的时候，几乎是一字不差。

“斯大林逝世后，我们几个中央领导人来到了孔采沃附近的别墅。他躺在沙发上，身边没有一位医生。斯大林生前最后几个月很少看医生。他怕他们。也许是贝利亚吓唬他，也许是他本人对所谓医生们正在策划反对他和其他领导人的什么阴谋信以为真。当时由一位曾经当过兽医的警卫队少校给他看病，就是这位少校打电话通知说斯大林逝世了……”

“我们站在遗体旁边，几乎什么话也没说。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事。后来就分别乘车走了。每辆车中坐两个人。最先走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之后是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这时，米高扬就对我说：‘贝利亚去莫斯科夺权了。’我对他说：‘只要这个坏蛋还在，咱们谁也不会感到安宁。’那时我便牢牢地记住了：第一件事就是要干掉贝利亚。可是怎么同其他领导人谈呢？……”

“过了一段时间，我便开始逐个走访了主席团委员。最

危险的是同马林科夫谈，因为他和贝利亚是朋友。不过我还是到了他那里，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我说：只要他逍遥法外并掌握着安全机关，我们大家就被捆住了手脚，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搞什么鬼名堂。告诉你说吧，几个特别师不知为什么正在向莫斯科附近集结。

“应当给予马林科夫以应有的评价：在这个问题上他支持了我，他摆脱了私人关系。看来他本人也怕自己的朋友。当时马林科夫是部长会议主席，并且主持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一句话，他也会有所失，但是谈话结束时，他说：‘是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要干得漂亮，不能坏了事。’

“后来，我又去找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同志就坐在这里，他还会记得的。我和他谈了很久。他非常担心，生怕整个砸了锅。我说的对吗？伏罗希洛夫同志。”

“一点不错，”伏罗希洛夫高声附和。他不知是因为难为情，还是因为喝了酒而满脸通红。“只是千万别打起来。”他不知为什么，不合时宜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关于打起来的事，得单独谈，”第一书记说：“于是我又去找卡冈诺维奇，向他交了底，他对我说：‘多数在哪一边？谁拥护谁？会不会有人支持他？’但在我对他讲了其他人的情况后，他也同意了。

“我终于去参加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了。大家都坐在那里，可贝利亚不在。我想，糟糕，他察觉了。当时我们还不至于人头落地，但到第二天我们会被弄到什么地方去那就很难说了。但正在这时候，他来了，双手拿着一个公文包。我马上就猜到了公文包里装的是什麼。不过我这回也准备了点东西……”